

综述·评介

●程焕文

图书馆人与图书馆精神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发展则具有重大作用。从这一唯物史观出发不难推导出一个结论:全部图书馆的历史实质上是图书馆人本身的历史。无论是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图书馆实践活动中,人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忽视了对人的研究,忽视了人的作用,尤其是忽视了对曾有所创造的人们的作用,实质上也就是抹杀了图书馆学术和图书馆事业。

一、“图书馆人物研究热”与 “图书馆人外流热”的启示

只要稍稍留神一下,就不难发现一种以人为研究中心的图书馆学研究已在全国各地兴起,并“静悄悄”地渗透到图书馆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股方兴未艾的图书馆人物研究热。它的形成有以下主要表象:

(一)“二千多年来,一大批目录学家、藏书家、校雠学家、版本学家和图书馆工作者,为建设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和图书馆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了解他们的生平业绩、学术成就,对发展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无疑是有借鉴作用的。”^{〔1〕}而“人物传记,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个领域。”读者在研习图书馆学情报学论著时,“往往是睹其书(文)而不知其人,知其名而不知其事。”^{〔2〕}近年来,人物研究已引起重视。在图书馆界兴起了一股图书馆人名辞典

和人物传记编纂热。如麦群忠主编的《中国图书馆界人名辞典》(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4月)、侯汉清等编译的《外国图书馆情报界人物传略》(山西图书馆学会,1984年5月)、申畅等编的《中国目录学家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和《中国目录学家传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等等。

(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国图书馆界逐渐重视探寻前辈和今人的学术思想发展过程,研究我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术的发展水平与成就,弘扬图书馆人的优秀品格和崇高精神。于是,在图书馆界出现了一大批前所未有的图书馆个人文集和个人研究文集。如史永元、张树华编辑的《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6月)、张世泰编辑的《杜定友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山图书馆,1987年3月)和《杜定友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广东图书馆学刊》专辑,1988年8月)、钱亚新等整理编辑的《杜定友先生遗稿文选(初集)》(《江苏图书馆学报》专辑,1987年4月)、钱亚新、白国应编的《杜定友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10月)、马先阵、倪波编的《李小缘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等。尤其令人赞赏的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四川省图书馆学会、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合编,张德芳、金恩晖主编的《当

代中国图书馆学学者个人自选集》——《图书馆学论丛》50种已陆续问世,而且有可能继续编辑下去。

(三)为纪念前辈、激励后人,80年代末期图书馆界兴起了一股召开杰出人物纪念会和研讨会热。如1986年10月由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江苏省图书馆学会、江苏省高校图工委联合发起主办了李小缘先生学术研讨会,与会者近200人;会议期间还开设了纪念李小缘先生陈列室。1988年1月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广东省图书馆学会联合召开了杜定友先生90诞辰纪念会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与会者500多人,并且设立了永久性杜定友纪念室。据悉,目前还有不少人倡导举办沈祖荣先生、韦棣华女士、袁同礼先生、刘国钧先生等人的纪念会和学术思想研讨会。

(四)80年代以后,全国数十种图书馆学理论刊物开辟了人物研究专栏。如《图书馆学通讯》的“学术传略”、“图书情报人物”,《北京图书馆通讯》的“纪念袁同礼先生”、“图书馆界人物”,《图书馆》的“书苑人物”,《黑龙江图书馆》的“人物篇”,《图书馆杂志》的“人物”,《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的“图书馆人物志”、“人物专访”,《图书与情报》的“人物”,《图书馆界》的“名人与图书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人物述林”,《四川图书馆学报》的“史志·人物”,《福建图书馆学刊》的“名人与图书馆”、“书海诗坛”,《文献》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等等。这些专栏既有长篇论文,也有短篇专访;既记“大人物”,也写“小人物”;既传前辈,也述今人;体裁丰富,形式多样,殊玉纷呈。

图书馆人物研究热给了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人生的回顾实质上是图书馆人精神的总结和弘扬。纪念前辈,终究只是形式而已。真正的目的在于继承其优秀的品格和高尚的精神。图书馆人物研究热的实质是弘

扬中国图书馆人所共同造就的优良传统——“图书馆精神”。张树华在《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代序中言:“我们不但要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学习他忠诚于教育事业和图书馆事业的可贵精神;而且要学习他不断探索新知识,新技术的求学精神,学习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学习他科学的治学方法,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图书馆事业,不断提高图书馆学的科学水平而努力。”^[3]王可权在《杜定友先生遗稿文选(初集)》序中说,我们应该学习杜老“酷爱图书馆,把一切献给图书馆事业的精神”,“毫不保守,改革创新的思想观念”,“耿直刚强,开拓前进的优良品格”,“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4]邱克勤在《李小缘先生学术研讨会筹备经过》一文中说:“召开这次李小缘先生学术研讨会,就是要学习他的爱国、爱书、爱图书馆事业的精神,继承和发扬他的思想和业迹,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图书馆事业努力工作,为当前两个文明建设多作贡献。”^[5]

第二,个人成就的总结实质上是事业与学术的弘扬。总结个人的图书馆学术思想成就和在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贡献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或树立个人形象,而是在通过一个个侧面和一个个个人物来弘扬图书馆事业与学术。正如张德芳、金恩晖所言:“诚然,图书馆学不能象文学等古老的学科那么幸运,但虽离以但丁的名字来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终结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始的日子为时尚远,也许在我们学科的发展史上永远不会出现这样伟大的思想巨人;但是,我们学术领域中的各个群体,毕竟是以每位学者的个人研究成果为细胞的,一木,一水,固然微不足道,但木成行,水成溪,乃至汇成茫茫林海,滚滚长河,就具有宏阔的气势和牢固的基础,足以显示出图书馆学的深度和广度”,并“正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我国图书馆学所取得的基本成绩和现实的水平。”^[6]

第三,“人文图书馆学”——一种以人为研究中心的图书馆学流派已呈现出形成的潜势,这里姑且把它称之为“人文图书馆学”。这种潜势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其一,人文图书馆学在研究方法上与现代图书馆学绝然不同:现代图书馆学是以信息与知识,或藏书与读者,或图书与图书馆事业,或知识交流与文献交流等为中心或出发点去研究,阐发其理论的;而人文图书馆学则是以“人(图书馆人)”作为研究中心去研究图书馆学术和图书馆事业,阐发其各种理论。它无疑为图书馆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其二,它以人为研究中心,从社会的人的角度去考察图书馆人与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术、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它与那种只见事物(藏书、图书馆)和理论的发展变化过程,而不见作为事物与理论创造者的发展变化过程的图书馆学研究相比,显得更加生动、形象、深刻。

其三,它以人为研究中心,既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人们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又能从中概括抽象出新的理论,对于图书馆实践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其四,它以人为研究中心,肯定图书馆人的作用,肯定图书馆人的人生价值,也就是从根本上肯定了生产力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决定作用,对于辩证地认识图书馆事业与学术发展变化的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五,它以人为研究中心,树立图书馆人的集体群象,与近几年试图用纯粹的高位理论,甚至玄奥的理论去提高图书馆的形象和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相比,显得更为现实而有力,并不自觉地把图书馆的形象和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图书馆人物研究热兴起的的同时,一些“怀才不遇”的图书馆人又不满现状,纷纷出国、“跳槽”,去寻找自己的归宿,实现个人的“理想”,从而形成了一股“图书馆人外流

热”。与此相反的是一大批中老年图书馆人仍然坚守图书馆工作岗位,敬业乐业;尤为可贵的是一大批青年学子又勇于投身图书馆工作,立志于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这一鲜明对比向我们透露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第一,社会效应:“图书馆——图舒馆——图输馆”事业责任感的滑坡。数十年来,图书馆人的事业责任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明显的滑坡现象。这一现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革”以前,虽然图书馆事业有过波折,但由于社会大气候对图书馆人有着良好的影响,图书馆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事业责任感传统,以“图(作动词解)书”——为人找书,为书找人作为崇高的职业与职责,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第二阶段是“文革”期间。由于社会气候的恶劣,相当数量的社会养闲人物涌入图书馆,其中不少是“老、弱、病、残”,他们没有事业责任感,图书馆变成了养尊处优的“图(作动词解)舒馆”。第三阶段是80年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思想教育的松懈,一向清贫的图书馆职业,对于那些“一切向钱看”的人来说,无疑是“书(输)”了经济利益,因而纷纷“跳槽”,抛弃了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责任。

第二,精神效应:图书馆人人生价值的坚挺。与上一效应绝然不同的是绝大多数图书馆人具有坚强的抗干扰能力,事业责任感不仅毫未动摇而且更为坚固。即使在“文革”期间,一大批真正的图书馆人仍然能够在极艰难的条件下默默地工作,维系图书馆经营之“术”,冒着危险保护藏书,并以此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80年代以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图书馆职业似乎并不象过去那样令人羡慕,然而一大批图书馆人明明知道从事图书馆工作就意味着与“书(输)”打交道,却甘愿“书(输)”掉个人的经济利益,而不愿虚度人生,以输(书)送知识去实现自己为振兴中华贡献毕生精力的人生价值,

只图奉献不求索取。这是图书馆人优秀品质与精神的体现与反映。

透过上述表象,我们可以得到更为深刻的启示:与其说是图书馆人用自己的血和汗,倒不如说是用“图书馆精神”发展繁荣了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学术。“人——精神——事业”三位一体密不可分。业已形成的图书馆人物研究热与图书馆人外流热要求我们对于图书馆人物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某一个人物的纵向研究,而应该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对一定时期内一群人、一代人,甚至全部的图书馆人进行横向研究,以树立图书馆人集体的群象,增强图书馆事业的凝聚力。

二、图书馆人才成团现象: “图书馆四代人”及其特征

所谓“图书馆人”,就是指一切曾经或正在从事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活动的人。“图书馆人才”是指那些在图书馆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较高的图书馆工作技能和能力,能够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图书馆学术或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图书馆人。图书馆人才必须具备创造性、社会性、时代性、进步性等本质特性和德、识、才、学、体、胆等必要条件,他们是图书馆人中比较精华、先进的部分,是推动图书馆学术与事业发展的全部“图书馆人”的代表。^[7]

人才的成长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分不开的。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一定历史时期人才辈出、人才集聚的现象。对这种人才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的人才学命题就是“人才团”,学者们也通常形象地称之为“人才链”。近一个世纪,中国图书馆的“人才链”现象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师徒型人才链。在图书馆人才的成长与发展中,名师出高徒的现象十分普遍。1949年以前的人才大多出自私立武昌图书馆专科学校。1949年以后至80年代

以前,又有很多出自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80年代以后又主要出自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中山大学图书情报学系、华东师大图书情报学系、南京大学文献情报学系、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等。这种师承关系的连锁反应,使得我国图书馆界的每一代人都与前一代人存在着师生或合作者的关系。

第二,传统型人才链。从我国悠久的图书馆历史来看,历史上近两千年形成的传统就是重理论而轻实践、重技术而轻应用。这一点在人才的成长与发展中影响至深,每一代人都不同程度地有重视理论研究忽视实践活动,重视技术方法研究忽视推广应用的倾向。另外,外来传统也就是异域业已形成的传统,在文化传播中也会发生影响。美国图书馆学人才的传统是重应用轻理论。这一传统在本世纪初传入我国后,许多人不自觉地继承了它。苏联图书馆人才的传统是重理论轻应用,本世纪50~60年代对我国亦颇具影响。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同文化传统的撞击,往往又会使得本国传统与异域传统相融合,形成新的传统。8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图书馆人才可以说明这一点。

据此,可以把本世纪我国图书馆人才粗略地划分为四代。

(一)奠基的第一代。20世纪初我国出现了近代图书馆。旧的藏书楼逐渐被新的图书馆所代替。但所谓的“近代图书馆”只是名称的变换,其工作技术、方法和理论几乎完全是旧的一套。近代图书馆的发展急需一批专门人才。于是20年代诞生了本世纪中国的第一代图书馆人才。他们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开创与奠基的一代。这一代人有以下特征:

第一,清一色留美。20世纪初,我国既无名副其实的近代图书馆专门人才,也无任何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在留学热潮中,一

批学子赴美攻读图书馆学，沈祖荣、胡庆生、刘国钧、洪有丰、戴志骞、袁同礼、李小缘、杜定友、杨昭晰、李燕亨等几乎都曾留学美国。第一代人的造就主要依赖美国，数量十分有限；然而，这一代人才的成长却有着较重要的意义。正如金敏甫先生在 30 年代所言：“民国以来，始有图书馆专家之造就，虽不能如外国之图书馆专家遍布全国，然为时尚未多，而能得如许之人才，亦堪以自慰耳。”^{〔8〕}

第二，阅历丰富。他们对欧美图书馆事业与学术有较深的了解，归国后又投身于我国图书馆事业与学术的发展，有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和近代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的转变的亲身经历。丰富的阅历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在他们中产生了许多非凡的人才。

第三，大器早成。20 年代图书馆人才、近代图书馆学理论和工作技术方法的匮乏与第一代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的相互作用，使得他们大器早成。他们大多数在 30 岁以前就已成就卓著名声显赫，成为图书馆事业的领袖人物。如杜定友先生在 30 岁以前，就先后担任过复旦大学图书馆、交通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并发表学术论文 130 余篇，出版著作近 20 部。

第四，创造力非凡。我国许多图书馆学理论和工作技术方法大都是由第一代人引进和创造的。第一个系统翻译《杜威法》的是沈祖荣和胡庆生，率先进行改杜的是刘国钧和杜定友。杜定友的《著者号码编制法》、《汉字排检法》等亦为中国特色的分类与排检方法之创始。洪有丰的《图书馆组织与管理》、杜定友的《图书馆学通论》和《图书馆学概论》、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等均为开创奠基之作。刘国钧还是中国图书史的奠基人。这种非凡的创造力在第一代人身上经久不衰。例如到 60 年代，第一个全面提出分类法与主题法理论的还是杜定友，70 年代第一个全面介绍马尔克（MARC）的

还是刘国钧。

第五，贡献卓越。第一代人的非凡创造力使得他们作出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卓越贡献。在 1949 年以前，沈祖荣、胡庆生创办发展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关——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杜定友、戴志骞、洪有丰、李小缘、刘国钧在全国各地举办了不少图书馆学短训班和讲习班。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与发展、近代图书馆学理论的创立与发展，尤其是各地图书馆的创办与发展，无处都不显示出第一代人的卓越贡献。50 年代以后，从《中小型法》到《中图法》，从大学图书馆专修科到图书馆学系，都和第一代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二）发展的第二代。第二代人的造就基本上在 30 和 40 年代。他们成才的巅峰正处在新图书馆运动基本结束近代图书馆开始发展的时期。他们与第一代人虽多有师承关系，但年龄上却比较接近。在近代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他们与第一代人相比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有其独到的特点。他们也经历了近代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的转变，并与第三代人构成师承关系。他们有下列特征：

第一，“国产化”。虽然第二代人不少是出国留学的，如留美的桂质柏、裘开明，留日的马宗荣等，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接受国内图书馆学教育以后再出国深造的。这与第一代人的成长过程大相径庭。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代人的主体基本上都是“国产”的。其构成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近代图书馆学教育兴起以后培养出来的人才，如查修、皮高品、周连宽、吕绍虞、张遵俭、严文郁、毛坤、汪应文、汪长炳、钱亚新等；二是长期从事图书馆工作但未受过图书馆学专门教育的一大批实干家，如柳诒徵、万国鼎、王云五、王献唐、王重民、陈训慈、张秀民等，他们又大多是在其它学科造诣颇深者。这一代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第一代，并和第一代共同构成了近代图书馆人

才的主体。

第二, 大器早成。他们与第一代人在成才的年龄上颇为相似, 绝大多数在 30 岁左右就显示出了出众的才华和贡献。如姚名达 30 岁以前就撰写出版了《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和《目录学年表》三部至今仍然有着巨大影响的著作。第一代人的影响和亟待发展的近代图书馆的需要使得第二代人的成长非常迅速。他们在青年时代便多已进入了图书馆事业的领袖层。

第三, 注重实务。如果说第一代人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上更加注重倡导、组织和决策的话, 那么第二代人则更加注重图书馆实务。不仅许多人在青年时代就已成为图书馆的主要领导和业务骨干, 而且大多一生都能努力职守, 兢兢业业地工作, 为近代图书馆的发展作出了许多默默无闻的贡献。正是这种实干精神, 才使得第一代人的努力与希望得以实现, 图书馆事业才一度得到发展。虽然作为单个的“图书馆人”, 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成就难以与第一代人相比, 但是他们不仅数量较大, 而且各自在不同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与成就, 所以其总体的成就是可以与第一代人的成就相提并论的。

(三) 开拓的第三代。第三代人的造就主要在本世纪 50 和 60 年代, 且与第二代人多有师承关系或低级合作者关系。他们成长于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创立与发展时期, 经历了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图书馆事业向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和由传统的手工操作向现代化的转变。他们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 科学的世界观。如果说他们是“留苏”的一代, 显然是不太恰当的。因为他们中留苏的也只不过有佟曾功、彭斐章、赵世良、鲍振西、郑莉莉、赵琦等近 10 人, 还有留美的孙云畴和陈誉等; 而更多的人, 如周文骏、朱天俊、张琪玉、黄宗忠、谢灼华、严怡民、陈光祚、倪波、金恩晖等则是国内培养出来的, 还有一大批长期从事图书

馆管理工作的, 如左恭、胡耀辉、丁志刚等。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和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图书馆学理论对他们影响至深。他们按照苏联的模式发展和繁荣新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与学术。到欧美图书馆事业与学术再度冲击我国图书馆事业与学术的今天, 他们仍能一如既往地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结合我国国情, 借鉴、引进、消化欧美图书馆理论、技术、方法和经验。科学的世界观为这一代人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 勇于开拓。从创业的角度来看, 第三代人的开拓精神是颇值得赞誉的。他们不仅改造了旧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而且还开创了新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创立和发展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一系列图书馆学理论和技术方法。他们大胆地开拓和发展了一个不同于第一代人所开创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

第三, 成就卓著。在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上, 他们的贡献是在前两代人所取得的成就之上的升华, 并且与前两代人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仅继承了前两代人开创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 而且还把它推向了繁荣。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成立, 全国几十所图书馆学系(专业)的创办与发展, 使得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图书馆学、目录学、分类学、编目学、情报语言学等一大批学科面目全新且日臻完善; 图书馆学著作和专业刊物, 其数量之多, 内容之丰富亦超越以往任何时代。从《中小型法》到《中图法》、《科图法》, 再到《汉语主题词表》和多项国家文献工作标准的颁布实施, 基本上都是第三代人努力的结果。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绝大部分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和图书馆事业建设成就几乎都是第三代人创造的。

第四, 大器晚成。由于他们成才的最佳年龄区 20~40 岁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其创造力受到了极大的压抑。10 年动

乱夺去了他们的宝贵年华。70年代后期，新的形势和新的环境使得他们压抑了多年的创造力爆发出来，一时间成果迭出，各种荣誉与地位亦纷至沓来，使得他们在步入中年以后才成为事业与学术发展的中流砥柱。

(四) 探索的第四代。第四代人基本上产生于8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与图书馆事业的变革使得这一代人成为探索与希望的一代。他们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将出多门。第四代人数庞大，超越历代，其成才的渠道之多亦史无前例。他们来自60余所图书情报学院（系、专业）或受过“五大”（函大、电大、自修、夜大、走读）教育，组成了一个由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等不同层次的集合体。留学外国者不仅数量很多，而且遍及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与前几代留学国别的单一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其造就具有鲜明的多渠道、多层次的特色。

第二，视野广阔。和前辈相比，他们更加注重知识面的拓展，尤其注重吸收其它学科的先进成果。从哲学到科学方法论，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国内到国外，他们都广泛地涉猎。他们往往能将问题置于宏观的背景中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研究，从哲学的高度、思辨的角度、理性的角度去观察、分析和研究，见解与观点往往比较新颖，理论性较强。

第三，富于探索。他们视野广阔并正处在思维敏锐时期，加之急切地希望我国图书馆事业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使图书馆学成为“显学”，近10年间，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富有积极意义的探索。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几次转变和全国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研讨会的召开等都显示了这一明显的特色。但是，由于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专业思想不稳定，出现了人才流失现象。

三、社会环境：图书馆人才成长与发展的外在因素

图书馆人才以一定的方式存在于社会之中，总是要受到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社会环境直接影响着图书馆人才的成长。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9〕}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涌现出来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时势造英雄。

时势造英雄有三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是时势召唤英雄。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和近代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的转变都要求有能够组织领导变革图书馆事业与学术的人物。第一代人和第三代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涌现出来的。现在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需要大量人才，可谓有志者生逢其时。其次是时势锻炼英雄。特定的历史条件提供了使英雄人物迅速成长的特殊机会，使平时默默无闻的人成为杰出的人物。20、30年代和50、60年代，以及80年代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教育的迅速发展和良好的学术气氛都锤炼了许多图书馆人才。再次是时势筛选英雄。大浪淘沙。历史根据能否满足时代的要求以及满足的程度，把真正杰出的人物推到历史舞台的前面，把相形见绌的置于次要地位，并淘汰落伍者。80年代图书馆人才的成长正在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四、图书馆精神：图书馆人才成长发展的内在因素

社会环境作为外在因素，对图书馆人才的成长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毕竟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内因。1988年笔者曾提出“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人才成长与发展的内在动力。^{〔10〕}现可将图书馆精神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爱国。爱国就是对祖国忠诚和热爱。它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近一个世纪来,图书馆界前辈之所以能够毫不吝惜地放弃国外的高薪优职毅然投身于振兴中华的洪流之中,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称誉的业绩,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的民族自尊、自信与自强精神。他们在成长与发展中的无数爱国主义事实已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精神是我们每个图书馆人所必须具备和发扬的。

第二,爱馆。爱馆就是忠诚和热爱图书馆事业。它包括强烈的职业自爱与自豪精神和服务与牺牲精神。许多图书馆界前辈都把图书馆事业看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并以此为莫大的幸福和荣耀。他们从不计较图书馆社会地位的低微,更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始终把图书馆工作看作是提高国民素质、振奋民族精神,最终富国强民的一项事业,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这种精神是我们每个图书馆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的职业精神。

第三,爱人。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热爱读者,树立读者第一的思想,努力争取读者、尊重读者,把读者工作看作是图书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至高无尚的工作。正如杜定友先生所言:“可爱的读者,凡是要阅读书报的人,都是可爱的”;只要“到图书馆的人”,“无老无幼,无贵无贱,都一体欢迎,毫无歧视”。^{〔11〕}今天我们提倡的“一切为了读者”,“为人找书,为书找人”,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二是热爱图书馆人。图书馆人既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还要尊重人才,爱护人才,见贤思齐。这一精神对于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职能,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始终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四,爱书。我国的文人学者和古代藏书家有着爱书的传统。一个世纪以来,图书馆界的前辈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他们爱

书如命,穷年搜讨,历尽艰辛,但又从不据为己有秘不示人。战乱年代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和保护祖国的文化典籍,逝世后又毫不保留地将藏书捐献给国家。他们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爱书故事。这种精神是我们每个图书馆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精神。

参考文献

- 〔1〕 麦群忠.中国图书馆界人名辞典(上册,古代部分,前言).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293
- 〔2〕 侯汉清等.译者的话.见:外国图书情报界人物传略.太原:山西省图书馆学会,1984.452
- 〔3〕 张树华.代序.见:史永元,张树华编.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1~11
- 〔4〕 王可权.序.见:钱亚新等编.杜定友先生遗稿文选(初集).南京:江苏省图书馆学会,1987.8~16
- 〔5〕 邱克勤.李小缘先生学术研讨会筹备经过.见:马先阵,倪波编.李小缘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7~9
- 〔6〕 张德芳,金恩晖.心血的凝集 文化的反思——《图书馆学论丛》总序.见: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等编.项弋平论文选.成都: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1988.5~8
- 〔7〕 程焕文.论图书馆人才的特征——关于“图书馆四代人”的探讨.广东图书馆学刊,1988,(3):22~29
- 〔8〕 金敏甫.中国现代图书馆概况.广州:广州图书馆协会,1929.50
- 〔9〕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450
- 〔10〕 程焕文.筚路蓝缕 鞠躬尽瘁——试论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杜定友先生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卓越贡献.见:杜定友纪念室编.杜定友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88.13~43
- 〔11〕 杜定友.广东文化论丛.广州:广东省立图书馆,1949.61

(作者单位:广州中山大学图书情报学系。来稿时间:1991.7。编发者:刘喜申)

collocation methods and 4 kinds of the arrangement of classification numbers.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 Applications

Collocation of Classification numbers — Rules and regulations

Document indexing — The Library of Railways

G254.122

A Preliminary Approach to the Application of Ozone to Library Sterilization / Li Jingren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 —1992, 18(2).32~34

The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ozone to the sterilization i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agencies from the aspects of introducing the basic knowledge about ozone, the density and effect of ozone sterilization, the effect that ozone has the writings on the book paper and the ozone sterilization equipments, etc.

Preservation of books — Studies

Ozone — Applications

G253.6

Librarians and the Library Spirit / Cheng Huanwen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 —1992, 18(2).35~42

By analysing the zeal for studying characters of the library world during 1980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concept of "humanistic library science" i.e. taking the "librarians" as the centre of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rarians and library undertak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rary and the society, and to elaborate theories of library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analy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generations of Chinese librarian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library spirit, the content of which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four phases: love for the motherland, love for one's library, fraternity among one's colleagues and taking good care of books. 11 references.

Librarians — mental style and features

Librarians — Professional morality

Library scientists — China

G251.6

A Review of the Study of Book Number System for the Arrangement of Chinese Books in China / Hou Youde, Zhang Yuhong and Zhao Huaisheng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 —1992, 18(2).43~45,68

In the last 40 years, more than 190 pieces of book-number research papers have been produced in China, and 25 types from 7 classes of schemes for working out book numbers were put forward. Since the August of 1990, the study of book number system has already brought into the limits of functions of the China National Technical Committee of Standardization for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CNTCSID). The pressing matter of the moment is: strengthening the leadership, tackling this key problem with a collective effort, formulating as early as possible standards for appraising book numbers and finally, taking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s of book number searching mixed with two or three-figure numbers of the author number as the way forward for book number system in China.

Call numbers — Studies and reviews

Book numbers — History

Author numbers — Studies

G254.13